

宋庆龄《广州脱险》一文史事考 ——兼谈宋庆龄对姚观顺的记述

林家有

宋庆龄 70 年前写的《广州脱险》一文，真实地记述了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叛变时，叛军的残忍和革命卫士队为保卫总统府、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英勇作战，冒死抗敌的高贵精神，也生动地记述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叛军的枪林弹雨中脱险的过程和许多亲历亲为的史事。这是一篇珍贵的史料和宝贵的革命历史记录，正如宋庆龄自己所称是她“将来自传中最动人之一章”，至今读来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

《广州脱险》一文 1922 年在报刊发表时，曾用过“粤变纪实”题目，1923 年 8 月，宋庆龄亲笔题名为《广州蒙难记》。原系英文稿，最早的译文发表于 1922 年 6 月 28—29 日上海《民国日报》。该报发表此文时前有国闻通讯社按语：“孙总统夫人于日前抵沪之后，本社代表前往访问，夫人因撰一文，述粤变实情，嘱为发表。”美国埃米莉·哈恩在《宋氏家族》一书中摘译了本文的大部分。由于以上两个译文不够准确，便给研究者带来许多误解和麻烦。现在我们通常所见的译文，是林语堂从宋庆龄处征得的旧稿重译文，编在 1938 年华光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一书中。《广州脱险》一文，最初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距离陈炯明叛变只有 12 天，文中记载的史事应该是大体可靠的，是研究陈炯明叛变和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遇难脱险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然而，由于作者

对一些史事来不及核实，一些事实记述不够清楚，加上一些当事人回忆所叙述的情况又不尽一致，这样就给研究者引证这些史料时出现记事不一的情况。在这里，我不准备就《广州脱险》一文记述的所有事实都加以考证，只是就其中的两件事进行考实，谈点看法。

其一，是关于对姚观顺和两位卫士的记述，有错。

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忆述她离开观音山总统府的情形时说：“是队长劝我下山”的。又说：为惟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五十名卫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在“听说”之前有删略号，译文删译的内容，我无法查到英文核对。但“劝她下山的队长”是谁？宋庆龄没有说。接着宋庆龄又说：“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中山先生的侍卫）。”根据各种材料，“队长”应是“总理卫士队”队长姚观顺。宋文说姚观顺是副官长，明显记错。两位卫兵，实则是两位副官马湘和黄惠龙。有的记述宋庆龄生平的专著把姚观顺说是副官长，把马湘、黄惠龙说是卫士，明显是从《广州脱险》一文移植过来。

姚观顺，美国埃米莉·哈恩所著《宋氏家族》一书称为“孙博士的外国随员鲍上校(George Bow)”。为什么说姚观顺是“外国随员”？为什么又称姚观顺为“鲍上校”？原因是这样的：姚观顺，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四区小隐村人（即今广东省中山市张家边区小隐乡人）。其祖父姚开伟，因家贫无地无法生活，在1845年便离家出洋到美洲卖苦力为生。其父姚保（字启瑞）在美国长大，英文名Yao Bow。按美国习惯名排列在前，姓排列在后，因此姚保在美国便姓Bow。George Bow家族，是当时当地六个著名华工家族之一。姚观顺英文名George Bow，1887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Grass Valley。由于姚观顺出生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所以埃米莉·哈恩说姚观顺是美籍华人。由于姚观顺钦佩孙中山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体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1912年于美国州立Northridge Military Academy陆军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便回国，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第四次会议

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组建军政府后，孙中山便任命姚观顺为大元帅府参军兼卫队大队长，把保卫大元帅府和大元帅人身安全的重任托付姚观顺。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姚观顺为北伐军大本营参军兼卫士队长。姚率卫士队随孙中山出师北伐到桂林、韶关，又随孙中山返回广州，参加各项防卫工作。1924年元旦，孙中山奖励广州观音山之役中保卫粤秀楼有功的拒敌卫士，发给每人金质奖章一枚，奖状一张。队长姚观顺名列讨贼奖章名册之首。孙中山并授予姚观顺少将军衔，外国报纸登载的 Genera Bow (鲍将军) 即指姚观顺，因为在1924年以前，姚观顺的军衔是上校，所以外国英文报刊也有译为“鲍上校”，因为他是美籍华人，所以也称“外国随员”。

陈炯明叛变进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时，姚观顺是卫士队队长（马湘说姚是卫士队大队长）不是副官，从事后姚观顺呈请大元帅孙中山大元帅论功行赏，颁发讨贼奖章的报告中可得到确证。该报告没有签署日期，但报告的落款则写明：“前任参军兼卫士队队长姚观顺”，并加盖私章，这是姚观顺自己写的当然无疑。1930年6月16日，广州政府在被战火焚毁的粤秀楼原址建立纪念碑——《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碑阴刻《抗逆卫士题名碑记》，将卫士的名字列上，首名者也是卫士队队长姚观顺。可见，《广州脱险》一文记姚观顺为副官长，实误。

还有一个与姚观顺有关的问题，是关于姚观顺在保卫粤秀楼期间的表现问题。

关于姚观顺在保卫粤秀楼期间的表现，马湘在他的《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有具体的叙述。他说：6月15日夜11时，孙先生从陈策、魏邦平电话报告中得知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其实孙中山不仅从陈策、魏邦平电话中得知陈炯明谋叛情况，还从其他渠道得知陈炯明谋叛的内情，但他坚持不肯离开总统府。孙中山命令马湘，“率领卫士小心守卫粤秀楼”。随后，马湘找到卫士队长姚观顺，“把先生的命令转告他，并和他商议守卫计划，随即

下令各班长率领全部士兵严密戒备”。姚观顺、黄惠龙(第一队长)和马湘(第二队长)奉孙先生之命,坚守粤秀楼。马湘说:“大约在十六日上午二时,叛军向我们进攻,并从镇武楼上用机枪向我们扫射。姚大队长指挥作战,我则负责护卫夫人。……敌人用电筒照着我们射击,我们则对准电光还击,敌人一连冲锋三十多次,都被我们击退,死伤惨重。”马湘这个忆述,除了一连打退敌人三十多次冲锋的记述不大可靠外,说明姚观顺的确在英勇地指挥作战、“冒死抗贼”。可是马湘下面的忆述则给人们留下许多疑团。他说:“将近天亮时,姚观顺腿部一连被击中两弹,不能指挥作战,我就请准了夫人,由我继续指挥。姚观顺负伤后,斗志动摇,竟命亲信士兵把白被布拿来,以备竖白旗之用。我发觉了,就问他取白被布何用。姚答:现在敌人过千,而且不断增援,我们子弹已将用尽,又无外援,眼见就要打败,不投降便没有办法,白被布是准备竖白旗的。我立即将姚的话报告夫人,并请夫人授权给我,无论何人投降,都予以枪决。这样,姚观顺就不敢动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80页)黄惠龙在他的《中山先生亲征录》中谈到“粤秀楼之血战”时,通篇均是与马湘如何分任指挥,保卫孙夫人至总统府,但对姚观顺不置一词。

马湘对姚观顺的品评跟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对姚观顺的记述是不一样的。从事后孙中山及宋庆龄对姚观顺的态度看,马湘对姚观顺受伤后的表现的叙述是不可信的。马湘说,姚观顺受伤后情绪极度低落,准备竖白旗投降叛军。要弄清楚马湘所言是否真实,关键人物是姚观顺命令去取白被布准备做投降白旗的“亲信”士兵。这个“亲信”士兵是谁?可惜马湘没有说。又如,既然姚观顺已经命令“亲信”士兵去取来白被布准备做白旗投降叛军,这不是什么秘密。既然不是秘密也不可能只是马湘一个人知晓,别人都不知道。可是我们遍查当事人的各种忆述,除了马湘之外,就连侍卫副官黄惠龙都从未言及姚观顺受伤后有准备竖白旗投降叛军的事存在。据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所说,当时同她一起离开粤秀

楼到总统府，除“二位卫兵”（按，是两位副官，即马湘和黄惠龙）外，还有姚观顺“副官长”（按，是卫士队长，不是副官长）共3人护卫，如果姚观顺受伤后发生动摇，产生投敌意向，绝对不可能只有马湘一个人知道，黄惠龙、宋庆龄都不知道。而且据马湘说，他已经将姚观顺准备竖白旗投降叛军的情况报告给宋庆龄，还说一旦出现卫士投降叛军，他已请示宋庆龄授权给他枪决投降叛军的卫士。如若真的如马湘所言，宋庆龄对姚观顺的“动摇”应该是很清楚的。然而，从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对于姚观顺的记述则并无对姚的表现有何异言，反而在文中对姚观顺受伤的情景作了详细的记载，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她写道：“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血流如注。一看，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而伤中一条大血管。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又说：“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而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但是他反安慰我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姚观顺对革命事业充满胜利的希望，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还安慰孙夫人坚持斗争。而且宋庆龄逃离总统府时头戴姚观顺的草帽，身上披着孙中山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可见姚观顺从粤秀楼到总统府一直被两位卫兵抬起走，经过几个钟头才进入了总统府后院，在他进入总统府后院之前，他一直同其他卫士一起，如果他真的命令亲信士兵去取白被布来做什么投降叛军的旗子就不会只有马湘一个人知道。总之，从当时的斗争和宋庆龄对姚观顺记述的情况看，马湘对姚观顺受伤后的忆述是不可信的，它不仅与宋庆龄的记述相违，反而大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嫌疑。

姚观顺在观音山之役中的表现，正如孙中山在1924年元旦颁发观音山之役卫士奖牌训词中所概述：“民国成立以来，我理想上的革命军只有这次观音山的卫士足以当之。这种奋斗的精神实在不可磨灭。”姚观顺被孙中山列为观音山之役有功将士的首位给予嘉奖。1930年6月16日，林直勉为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管理委员

会建卫士纪念碑所写的碑记引用孙中山的话也写道：“自民国成立后，革命之师，虽日益增，而其精神，则反不如前。惟陈逆叛时，戍守粤秀山之卫士姚观顺等，与叛兵血战两昼夜，坚持无馁，诚为近所罕见。”（《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第62页）据姚观顺的次女姚曼裳提供的材料得知，事后宋庆龄对姚观顺一直很是关心，如1925年姚观顺在故乡广东香山县小隐村建屋给其父姚保居住，宋庆龄以个人名义送一匾，上书翠绿色“隐庐”二字挂于新屋门楣。1956年宋庆龄到翠享村参观“中山故居”还从石岐打电话到张家边区小隐乡政府找寻姚观顺，足见孙中山与宋庆龄对姚观顺的关切和尊重。如果姚观顺有过动摇变节意向或行动，孙中山和宋庆龄是不会那样以情相待的。

其二，是关于记述卫护粤秀楼的卫兵和伤亡人数，有误。

守卫观音山总统府的卫兵有多少？伤亡多少？各人忆述不一。

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说陈炯明的叛军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将她从酣梦中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但宋“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经“再三婉求，他始允行”，但是孙先生则“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1922年6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在题为《总统在粤出险之情形》中载：“总统之卫队八十人，但八十人中竟无一人出险，尽死于枪林弹雨之下，极为可惜。”6月29日蒋介石在他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中，也写道：“府中卫士仅五十余人。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防御。”马湘在《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559—670页）中，只谈当时卫队有武器“一百发手提机关枪三十支”，其余就是“驳壳手枪、五响步枪”，但没有说卫士有多少人。黄惠龙在《中山先生亲征录》（《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617—635页）中，说守卫粤秀楼的卫士，“只有五十人”。这个说法同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所言相合。孙中山在颁发观音山之役卫士奖牌训词中，也明确指出：保卫观音山的卫士有50多人。但这个数字显

然是不准确的。宋庆龄和孙中山所说的都是估量数。具体人数，据姚观顺呈报的名单共计卫士是 62 名。具体名字如下：

队长：姚观顺

侍卫副官：黄惠龙、马湘、陈煊

侦缉员：陈龙

卫士：冯俊、黄森、何良、陈海廷、李东兴、郑耀、容卓廷、邹海、冯朝、曾明、黄仲、梁有贤、陈桂标、刘少溪、冯建廷、刘礼泉、蔡铁侠、陈成、曾国辉、梁全胜、区锦由、黄作卿、邓国兴、曾维垣、周文胜、谭卫全、冯振彪、陈胜、黄成、何福廷、谭森、丘堪、蒋福卿、张停、陆福卿、冯汉明、丘炳权、梁表云、王桂昭、邓胜钦、张禧、王玉、陈标、杨带、王基、杨勋、李球、蒋安廷、蒋桂林、冯桂林、彭启、蒋庆禧、邝景云、江德、陈松、韦汉雄、黄世祥。

姚观顺在请求孙大元帅颁发讨贼奖章开列的名册中，还说明以上 62 名卫士在“粤秀楼拒敌”。

由卫士队长姚观顺呈送给孙中山的名单是经过核实的准确无误的。林直勉在其撰写的《抗逆卫士题名碑记》中云：“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逆贼陈炯明叛于广州，为曹锟、吴佩孚诸贼应，遣其将叶举，率兵犯公府，谋弑元首，冀逞其篡夺之私，时公府卫士仅六十余人，枪械不满三十，死守粤秀山，奋勇抗敌，逆兵多至四千余，而卒莫之能夺，呜呼！陈逆当时仍于政府任陆军总长要职，乃称兵拢乱，自取罪戾，以视六十余卫士各尽阙职，为国奋斗，其为贤不肖，相去何如也。”该碑阴镌刻卫士队 62 人名单。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开列抗逆卫士姓名者则仅有 50 名，加上卫士队长姚观顺，共 51 名，缺区锦由、黄作卿、邓国兴、曾维垣、周文雄、谭卫全、冯振标、陈胜、黄成、何福廷、梁全胜等 11 名。此外，还有 4 个写错名字，即陈成，写成陈威；李东兴，写成李东英；江德，写成汪德；黄惠龙，写成黄龙惠。

为什么《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开列的抗逆卫士姓名少 11 人？时至今日我还不清楚其中的原由，无非是下述几种情况：其一，是匆促印制，校编者粗心疏忽；其二，是这 11 名卫士后来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其三，是这 11 名卫士在观音山战役中表现平平；其四，是因为宋庆龄在《广州脱险》文中说：孙中山“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是不是林直勉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中开列的 50 名卫队姓名者（队长姚观顺除外）即是孙中山命令留守总统府的 50 名卫士？上述四种情况，属第四种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写错名字则纯属粗疏。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在保卫粤秀楼战斗中伤亡的卫士人数。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说 16 日黎明，“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是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50 名卫士中 1/3 人伤亡，当在 16—17 名。宋庆龄说：这是她“听说”来的消息，但听说她没有明说，但既然是“听说”，当然不足为据。黄惠龙在他的《中山先生亲征录》中，也说“五十人大半带伤”。又说：“余知此时枪子将绝，再无守法，若不请夫人离去，何以对总理？乃以实状报告，夫人乃许离去粤秀。”黄惠龙的所谓“实情”，其实是夸大了卫士的伤亡情况，目的正如他说是让宋庆龄答应撤离粤秀楼。由此可见，宋庆龄在《广州脱险》文中说：“听说”，守卫粤秀楼的五十名卫士“竟无一人幸免于难”（或说：“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都是从黄惠龙等人夸大伤亡人数口述中听来，毫无事实根据。孙中山于 1922 年 8 月 9 日离穗经香港赴上海，在 9 月 18 日发表《致海外同志书》中，详述陈炯明叛变经过，内称陈“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因为孙中山离穗之前一直忙于指挥平叛，许多消息和情况都不了解，更有可能去核实各种事实，其实当时也无法核实，所以所谓“卫士死伤枕藉”，只是凭印象去说明陈炯明叛军的残暴，以此来激起海内外同人对陈炯明叛国的共愤。

关于保卫粤秀楼卫士伤亡情况，马湘说：从 15 日晚战至 16 日天明，“我们只有四个人受伤”，这个说法比较接近实际。邓泽如在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书中称，保卫粤秀楼的卫士仅伤5名，无人阵亡。据姚观顺呈请孙中山颁发保卫粤秀楼阵伤奖章名册可知，从保卫粤秀楼到护卫宋庆龄离开总统府受伤的卫兵只有刘礼泉、陈海廷、冯潮、李东兴、王桂昭等5名，加上受伤的队长姚观顺，共受伤卫队官兵6人，无一人阵亡。这是经过核实的情况。

宋庆龄记述她在陈炯明叛变期间脱险经过的《广州脱险》一文，是在事件发生后十余天撰写的。但因为有些情况是她亲自经历和目睹的，有些是她听别人报告的，有些人和事她不熟悉，有的情况她不了解，因此有的记事、有的记述与真实事实有出入，有的记述不甚清楚都是难免的，因此我们在引用该文时应该注意。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广州脱险》一文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梁尚贤）

（作者林家有，1937年生，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